

名人是怎样做父亲的

鲁迅用报纸打儿子屁股 丰子恺反对培养“小大人”

本周日就是2016年的父亲节了。这一节日的确立,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,希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,“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”。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,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,佩戴白玫瑰对逝去的父亲们表示悼念。

不过,节日本身只是某种仪式,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在节日之外,“怎样做父亲”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,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。“父母对于子女,应该健全的产生,尽力的教育,完全的解放。”呼喊“救救孩子”的鲁迅,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如是写道。

除了鲁迅,还有钱基博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胡适、丰子恺等,他们在做父亲方面都是言传身教,身体力行。父爱,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
鲁迅 恼时用报纸打儿子屁股

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,即周海婴。儿子出生时,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,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,他果断回答:“留大人。”结果母子平安。

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,称其为“小红象”,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“小白象”,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,所以叫“小红象”。

在儿子成长过程中,鲁迅让儿子“完全的解放”。据周海婴所著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介绍,鲁迅的教育方式是“顺其自然,极力不多给他打击,甚或不屑拂逆他的喜爱,除非在极不能容忍,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”。有一天,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,鲁迅恼了就用报纸打他屁股。后来,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:“打起来,声音虽然响,却不疼的。”足以显示出父爱。

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去世,次日,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他的遗嘱,其中第五条写道:“孩子长大,倘无才能,可寻点小事情过活,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,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,成为无线电专家,一生“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”。



鲁迅与周海婴(摄于1930年)



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(左一)、三子梁思忠、长女梁思顺(摄于东京)

梁启超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

梁启超有九个子女,在他的教育、引导下,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,甚至还产生了“一门三院士”的佳话。这“三院士”是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考古学家梁思永、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。另外,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,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,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。

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,不仅在求学,在为人处世,甚至理财、时政等诸多方面,皆以平和、平等的态度展开。阅读《梁启超家书》,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。

在求学这一方面,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,而是强调打好基础,掌握好“火候”。他对梁思庄说:“未能立进大学,这有什么要紧,‘求学问不是求文凭’,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。”并教孩子们求学问、做学问的方法——“总要‘猛火炖’和‘慢火炖’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”。

同时,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。1923年,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:“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,只要在自己责任内,尽自己力量去做,便是第一等人物。”

胡适 平时不亲热,只知责怪

1908年9月,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,他发表了《论家庭教育》一文,在文中,强调“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”。

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,女儿五岁时夭折,长子胡祖望、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,胡适忙于公务,无暇顾及。江冬秀出身官宦之家,仅读了几年私塾,她酷爱打牌,对于孩子管教方面投入精力较少,不甚得法。

在家庭教育中,胡适虽然倡导“独立、合群、重学”,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。1929年,胡适给胡祖望写信,希望锻炼他过独立、合群、用功读书的生活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功课要考最优等,品行要列最优等,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,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。”这时,胡祖望刚刚十岁。晚年,胡适对秘书说:“娶太太,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;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,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,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。母亲有耐心,孩子没有教不好的。”可谓沉痛之语,意味深长。

在给江冬秀的信中,胡适亦自我反省道:“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。平时不同他们亲热,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,习气不好。祖望你交给我,不要骂他,要同他做朋友。”

钱基博 做君子比做名士要紧

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,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父亲。据说,钱钟书周岁时“抓周”,小手没有抓玩具,没有抓糖果,没有抓铜钱,而是抓起了一本书,钱基博自己就非常喜欢读书,因而喜出望外,为其取名“钟书”。

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,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、听说话,四处闲走,下午才授课,他玩得很开心。1920年,伯父去世后,由钱基博直接教育。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,钱钟书十六岁时,还曾被痛打一顿。此后,钱钟书才真正奋发读书,为日后治学打下了“童子功”。

1929年,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,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。一封信中说,“做一仁人君子,比做一名士尤切要”,随后一封信则表示:“现在外间物论,谓汝文章胜我,学问过我,我固心喜;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,我尤心慰。”希望钱钟书能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,我望汝为诸葛公、陶渊明;不喜汝为胡适之、徐志摩。”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,埋首国学,他这样告诫钱钟书,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。



胡适全家,胡适(右一)、江冬秀、长子胡祖望(左一)、次子胡思杜



钱基博与钱钟书



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(右)、次子梁培恕(摄于1936年)



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、儿子杨子耘观看外公画画(摄于1963年)

梁漱溟 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

1918年11月7日,自杀前三天,梁济问儿子梁漱溟:“这个世界会好吗?”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!”说罢,梁济离开了家。

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,但最终,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,他不停思考,积极奔走。梁漱溟育有梁培宽、梁培恕两子,对于他们给予很大自由空间。接受采访时,梁培恕说:“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,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。”这种教育,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,梁济对他就是“信任且放任”的。

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,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。当时,梁培宽考了59分,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。“他只看了一眼,就又还给了我。”梁培宽说,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,“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”。

相比于课堂成绩,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。“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,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,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。”在《教育与人生》一书中,梁漱溟一再强调“生活本身的教育”。

丰子恺 反对培养“小大人”

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,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,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“小大人”,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《小大人》,缘起是他曾看见: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,戴上小铜盆帽,教他学父亲走路;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,在脸上涂脂抹粉,教她学母亲一样。在丰子恺眼中,这样的“小大人”简直是“畸形发育的怪人”。

在生活中,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“无聊”,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,抱孩子,喂孩子吃饭,唱小曲逗孩子,画画引孩子笑,和孩子们特别亲近。有一次,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,“满满地抱了两手回来”,到家时,却熟睡在父亲肩头,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。

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,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。1947年,他步入知天命之年,与子女“约法”,强调最多的便是“独立”,其中一条写道:“大学毕业后,子女各自独立生活,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,父母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。”同时,子女独立后,要与父母分居,“双方同意而同居者,皆属友谊性质,绝非义务。”

据《西安晚报》